

语法化词汇化与汉语研究丛书

语法化与汉语时体研究

陈前瑞 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

语法化与汉语时体研究

陈前瑞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法化与汉语时体研究 / 陈前瑞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7. 3

(语法化词汇化与汉语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486 - 1144 - 8

I. ①语… II. ①陈… III. ①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IV. ①H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3646 号

语法化与汉语时体研究



作 者—— 陈前瑞

责任编辑—— 李晓梅

封面设计—— 魏 来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地 址: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传真: 021 - 64515005
网址: www.xuelinpress.com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网址: www.ewen.co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23 万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6 - 1144 - 8/H · 77

定 价—— 5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总 序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认知语言学成为语言学的重要领域,而作为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基于认知的语言演化——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也迅速成为语言研究的热点领域。语法化和词汇化被认为是语言演变的两个重要方面,并且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跟语法化相关的实词虚化,一直为汉语语法研究所重视,但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引入“语法化”理论后,语法化研究才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虽然汉语词汇学一直重视构词法和造词法,汉语词汇史研究者也十分重视汉语词汇演变及双音化问题,但直到 90 年代后“词汇化”伴随语法化研究的深入才成为汉语词汇和语法研究的重要课题,21 世纪以来,“词汇化”同样成为汉语语法词汇研究的热点。

由于汉语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时间还不长,系统性的专著还不多见,研究成果大多以论文形式或会议论文集形式呈现,这不利于后学者的研读和继续研究,有必要将汉语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主要学者的研究论文汇编成集以飨后学。学林出版社一直致力于学术著作的出版,尤其对语言学著作情有独钟,过去出版有许多语言研究专著,并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影响。近年来,我们也一直跟学林出版社及吴耀根先生不仅在图书出版上有很好的合作,而且在出版理念、学术发展、学术推广等方面也时有交流。编辑出版“语法化词汇化与汉语研究丛书”的想法正是在这种充满事业与学术气氛的多次畅谈中逐渐明晰,并得到学林出版社领导的热情支持。

在丛书的选题和作者的遴选,得到国内从事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的一些著名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全力配合,吴福祥先生、杨永龙先生、董秀芳先生、张谊生先生等在前期策划中出力多多,著名语言

学家江蓝生先生爽快答应把大作编入丛书,着实令策划者感佩,也进一步激发了我们编好本套丛书的动力。真诚感谢各位作者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语法化词汇化与汉语研究丛书”含9位学者近些年来有关汉语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的个人论文集,这9位学者分别是江蓝生、李宗江、张谊生、吴福祥、杨永龙、董秀芳、史金生、陈前瑞、陈昌来,这9部论文集大致能反映出当前汉语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和最新成果。

近年来,汉语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新的成果也不断出现,但由于我们的视野所限,可能还有会很多学者被遗漏。好在目前这套丛书只是第一批,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关注语法化和词汇化研究,适时推出更多批次。

由于能力有限,“语法化词汇化与汉语研究丛书”在编辑过程中一定存在许多问题,恳请学界批评指教。

陈昌来

前 言

在中国语言学界,现代意义的语法化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兴起并呈燎原之势,逐步席卷汉语史、现代汉语和汉语方言等语言学分支领域。笔者是从2001年10月在南开大学举办的首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开始接触到语法化学说,属于汉语语法化研究的后学,主要是从语法化和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汉语的时体问题,陆续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学林出版社策划本套“语法化词汇化与汉语研究丛书”,以汇聚汉语语法化和词汇化的研究成果,承蒙邀请,笔者从已经发表的论文中选出12篇,辑为《语法化与汉语时体研究》,既方便学界查阅,也希望得到更多的批评指正。

本论文集按照内容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综述性论文,分别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梳理时体语法化的脉络和体貌的理论体系,共2篇。理想状态是先梳理国内外时体语法化的发展脉络,然后再开展汉语时体语法化的研究。但受研究条件的限制,这篇时体语法化的综述性论文实际上是在稍后才完成的。

第二类是跟时体问题相关的主观性与主观化的研究,包括对“来着”和“在、呢”的研究,计2篇。前者是历时的研究,后者是共时的研究。两篇论文都试图在主观性和主观化的研究方面引入量化的分析。

第三类集中讨论汉语完成体表达的一种特殊句式即双“了”句,包括2篇文章,侧重从历时和语言接触的角度在宏观上解释双“了”句的兴衰。

第四类是对具有表示状态意义的结果体用法的时体标记研究,计3篇。这些标记有的从结果体发展出完成体的用法,如上古及以

2 ① 语法化与汉语时体研究

后的“也”；还有从结果体发展出进行体的用法，如近代到现代的“着”，从而兼有完成体和进行体的用法；上古汉语的“方”在兼有前两种用法之外，还形成了最近将来时的用法。

第五类是将来时的用法研究，共3篇。两篇是研究句尾“了”在完成体的基础上发展出最近将来时的用法，一篇是研究上古汉语的“当”如何先产生义务义用法，进而产生出将来时的用法。

上述单篇论文虽然以研究汉语具体的语法语素的语法化为主，但都是基于时体类型学的概念系统，从跨语言视角来研究汉语时体语法化的共性与个性。由于是单篇论文的结集，只是在局部做了必要的修改，因此在概念铺垫方面难免有所重复，但又无法充分展开。不尽之处，敬请参见相关的论著。

陈前瑞

2015年8月2日

目 录

前言	1
时体语法化研究的历史脉络	1
当代体貌理论与汉语四层级的体貌系统*	21
“来着”的发展与主观化	31
汉语内部视点体的聚焦度与主观性	49
汉语双“了”句的兴衰及相关理论问题	64
语序接触与北京话双“了”句的历时波动	78
句末“也”体貌用法的演变	99
“着”兼表持续与完成用法的发展	116
副词“方”多种时体用法的关系	132
句尾“了”将来时间用法的发展	150
从完成体到最近将来时 ——类型学的罕见现象与汉语的常见现象	162
“当”的情态与将来时用法的演化	183
参考文献	201
引书目录	218
后记	219

时体语法化研究的历史脉络*

提 要 本文分四个阶段评述时体语法化研究 40 多年来的发展,尝试以语法化研究的精神来研究时体语法化的历史脉络。就整体格局而言,时体研究语法化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研究视角扩展及语言类型学、语料库语言学、构式语法、接触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就个体研究而言,其趋势是研究对象的专门化和研究方法的综合化。借鉴历史经验,汉语时体语法化的研究应侧重语法语素的用法研究,参照类型学的概念系统,努力探讨汉语时体标记语法化的个性与共性。

关键词 时体语法化历史

一 引 言

语法化研究在中西方都可以追溯到数百年之前,但是现代意义上的语法化研究却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开始的。40 多年来语法化研究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再度激活了历时语言研究,而且伴随着语言类型学的兴盛,将语言研究的历时、共时和跨语言比较这三种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极大地推进了人类对自身的语言、语言的起源乃至人类自身演化进程的理解。时体范畴作为语言中最重要的语义与语法范畴之一,一开始就成为语法化研究的重要对象,时体语法化研究代表了语法化研究在语料、理论和方法

* 本文是笔者与孙朝奋教授合作完成,是第一作者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在斯坦福大学东亚系进行访问研究期间与第二作者合作完成的。研究工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BYY050)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8-0744)的支持。论文在第 2 届汉语历史词汇与语义演变学术研讨会(2011 年 6 月 8—9 日,杭州)报告后,得到了吴福祥教授的指教。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等多个方面的成就。

本文评述时体语法化研究 40 多年来的发展,尝试以语法化研究的精神来研究时体语法化的历史脉络。也就是将时体语法化研究置于整个语法化研究的历史语境之中,分析特定环境中的语义、语用因素也就是整个语言学的话语环境如何促进了时体语法化研究的演化。

本文将时体语法化的研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语法化理论框架形成前的时体演化研究(1960—1979),以 Kuryłowicz(1964)、Ullmann(1972)、Givón(1979)为代表,这一时期鲜见讨论时体语法化的专门论文,都是在讨论其他问题时涉及时体的演化或语法化。第二阶段为语法化理论框架形成期的时体语法化研究(1980—1989),以 Fleischman(1982)、Bybee(1985)、Dahl(1985)、Brinton(1988)、Bybee & Dahl(1989)为代表,出现了讨论罗曼语将来时和英语体貌发展的专著以及时体语法化的理论性论文。第三阶段为语法化理论成熟期的时体语法化研究(1990—1999),以 Bybee et al.(1994)、Hewson & Bubenik(1997)为代表,出现了讨论世界语言时体语法化的专著。第四阶段为语法化理论多元期的时体语法化研究(2000—2011),以 Dahl(2000d)、Hilpert(2008)、Kranich(2010)为代表,出现了一批讨论某个语言特定时体标记语法化的专著。四个阶段显现了时体语法化研究从微观到宏观,再从宏观到微观的演化过程。

Hengeveld(2011)在话语功能语法(Functional Discourse Grammar)的概念框架里,综述了时体的语法化,其重点在于时体由哪些范畴演变而来,又向哪些范畴演变而去,是在特殊的理论框架内对时体语法化路径的介绍,未涉及时体语法化研究的历史脉络,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对于时体的术语本文一般依照 Bybee et al.(1994)的定义,文献中不同含义的术语尽量随文解释。汉语时体演化研究的历史拟另文讨论。

二 语法化理论框架形成前的时体演化研究

学术界通常把语法化研究第一部理论专著 Lehmann 的 *Thought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 Programmatic Sketch*(1982)作为语法化理论框架初步形成的标志,我们把此前的 1960—1979 称为语法化理论框架形成前的时期。Lehmann(1982/2002)指出,语法化理论是从印欧历史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发展而来的。因此,追踪早期的时体语法化研究首先必须

回溯到这两大研究传统。由于这一时期语法化的研究框架尚未成型,语法化的术语还没有被广泛使用,所以在评述这一时期时体的历时研究时,本文主要采用“演化”这一术语。

2.1 印欧语历史语言学的时体演化研究

本文对印欧语历史语言学的时体演化研究的评述仅以 Jerzy Kuryłowicz 的代表性研究为基础。Jerzy Kuryłowicz 是波兰历史语言学家,是 20 世纪印欧语言研究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① Kuryłowicz 在其著作 *Inflectional Categories of Indo-European* (1964) 的序言中指出:语义平行性被证明是内部构拟的重要手段。下面的语义演变在所有的语言中持续不断地独立发生:从重复到持续;从现时状态到完成体 (static present > perfect);从意愿到将来时……这些演变体现了历时的共性,并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根植于基本的言语情景。

该书在系统论述印欧语言屈折范畴时,对时体的概念、欧洲语言时体系统演化的关系、时体与其他范畴的演化关系都做了详细的讨论和精彩的概述。比如,作者把拉丁语体范畴的特征概括为前时性 (anteriority),即指称动作在某个特定时刻的同时或之前发生,体现为同时体 (simultaneousness) 与先时体 (anterior) 的对立;把希腊和斯拉夫语体范畴的特征概括为完整性 (perfectivity),即指称在某个时刻动作本身 (action itself) 的状况,体现为未完整体 (imperfective) 与完整体 (perfective) 的对立。(第 90 页)(详情参见 3.2)。在此基础上提出,前时性的体系统是完整性的体系统的进一步发展。

2.2 类型学的时体演化研究

早期类型学的时体研究集中于斯坦福大学出版的 *Working Papers in Language Universals* (WPLU, 1969 - 1975) 以及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Greenberg et al. 1978),其重点在于描述时体的共时共性,但也关注时体的历时共性,且侧重于从词汇来源的维度研究时体演化的共性。这里仅评述 Ultan (1972)、Blansitt (1975)、Traugott (1978) 的研究。

Ultan (1972/1978) 的主题是“将来时的性质”,其中有专门的小节讨论将来时的词源,总结了将来时与体貌、情态范畴之间在演变上的单向性。

① 参见 <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325432/Jerzy-Kurylowicz>。

比如,基本的位移动词可以演化成将来时,但相反方向的演变却不成立。Blansitt(1975)认为,进行体与非进行体的语义区别很可能是普遍性的。该文重点研究了表达进行体的复杂动词短语的类型,并根据复杂动词短语中助动词的语义分为4类:1)带系动词的动词短语;2)以位移类动词为助动词的动词短语;3)以“做”义动词为助动词的动词短语;4)以其他动词为助动词的动词短语。且这4类在作者的语言样本中的频率依次降低。该文的分类层次清楚,首先从意义到形式,再进一步分析形式的语义来源,内在地体现了类型学研究与语法化研究在宏观研究思路上的 consistency。

Traugott(1978)从宏观角度论证时间范畴与空间范畴的对应关系。Traugott认同如下看法:应当区分表示完结或结果的 terminative 和 Comrie(1976)表示“整体观察”的 perfective,前者是动作的语义类型(aktionsarten),后者是比较纯粹的体(aspect);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如果某个语言具备 perfective,且其 perfective 使用跟源点、终点、路径和维度相关的类型来表述的话,那么就发生了从 terminative 到 perfective 的扩展。这一假设实际上解释了两大大类体貌意义之间的语法化联系,具有很强的概括性。

2.3 功能主义的时体演化研究

Talmy Givón 对语法化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提出的“今天的形态就是昨天的句法”(1971)^①成为功能主义和语法化研究的标语,他提出的“话语→句法→形态→形态音位→零形式”(1979: 209),高度概括了语法化单向性,并把话语功能视为语法化的起源和动因。这在已有的词汇来源的研究维度之外,促成了话语维度的语法化研究(Hopper, 1996),同时也促成了话语维度的时体语法化研究。

Givón(1979)指出,典型的时、体、态标记往往来自数量有限的一组动词或助动词,这在不同语言中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如“来、结束、拥有、做”义动词经由完整体发展成过去时,“要、是、去”义动词经由不同的路径发展成

^① Givón(1971)标题为: Historical syntax and synchronic morphology: An archaeologist's field trip. (历史句法和共时形态: 一个考古学家的田野之旅)。标题有个题注: 这次田野之旅部分受到一部文集的影响; 这部文集的许多部分被视为孔子所作, 但最可能是源于最伟大的永远的行道者(tripper)——老子。这位行道者在被告知汉语是一种孤立语时评论说: 孩子们, 不要哭泣, 因为今天的句法就是明天的形态。Givón 2010年3月在北京语言大学的座谈会上指出, 这只是一个玩笑; 但从中可以看到老子有无相生的思想对他的影响。

将来时。而且 Givón 还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生此类演变的构式就是他所谓的等同主语结构式(equi-subject construction)。从历时的角度来看,两个联系松散的小句经由句法化(syntacticization,与语法化相近)的过程浓缩为一个小句,其中第一个小句的主动词发展为时、体、态标记。Givón 认为,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句法化与语法形态的形成似乎是密切相关的,并反映了人类语言从基于语用的模式向基于句法的模式演变的过程。这里借用 Blansitt(1975)和 Heine & Reh(1984)都引用过的一个典型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 (1) *me na me wu*
 I be I eat
 'I am eating'
 我在吃饭

在非洲 Tyurama 语言中系动词 *na* 与主动词 *wu* 之前都有一个人称代词 *me*,这就是 Givón 所谓的等同主语构式(equi-subject construction),Heine & Reh(1984)视为连动式,其中第一个动词 *na* 发展成为进行体标记。

另外,Hopper(1979)侧重从微观的角度观察时体标记与具体的话语功能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语言中,完整体这一语义范畴都是用于叙述事件时间进程的前景这一话语功能,而未完整体总是与话语中提供相关支持信息的背景相联系。作者还指出,在语篇中考察时体的历时发展,这明显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只是这一领域几乎还没有开始探索。

2.4 其他语言理论与时体演化研究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John M. Anderson 就提出了方位主义理论(Localism),该理论认为空间表述相对于其他非空间的表述而言,在语法和语义上是一种更为基础的表述形式。(参见 Anderson, 1971,转引自 Lyons, 1977,下文对方位主义的介绍均引自 Lyons, 1977)。空间主义理论有不同的版本,其中最温和的空间主义局限于如下没有争议的事实,即时间表达在许多互不关联的语言中都是源自空间表达。就时体而言,体的区分比时的区分具有更加明显的空间性。许多语言里进行体或持续性的状态等概念都是用源于方位的结构式来表达,比如,早期英语的一种进行体的形式就是由方位介词与动名词形式构成,如 *I've been a-courting Mary*

Jane(我一直在追求 Mary Jane),该结构中的 *a-courting* 被视为从 *at courting* 派生而来。方位主义理论对不同时期的时体语法化研究均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前文讨论的 Traugott(1978)就是以方位主义理论为基础,探讨空间向时间引申的维度限制。后文讨论的 Brinton(1988)证实,英语中动词前的体貌标记语与动词后小品词都是源于具有特定的空间意义的成分。

在语言理论的著作中,时体问题一般是在语义学的框架内加以讨论。Lyons(1977)不仅讨论了时体范畴与其他范畴的语义区别,而且注意讨论时体的跨语言变异和演化。Lyon 还特别讨论了 perfect(完成体)的性质与历史演变。一般认为,完成体常常源于表示状态的体貌意义,且表示动作完成后带来的相关状态。Lyon 进一步指出,英语状态动词(如 *know*)与非状态动词(如 *learn*)的完成体形式(如 *has learned*)存在一种话语蕴含关系(implicature)而非严格的衍推关系(entailment),如“X know Y”(X 知道 Y)蕴含“X 学了 Y”但不能衍推“X 学了 Y”。由此导致状态性的完成体会进一步发展成为非完成体的状态表达形式,如英语的 *He has got a cold* 中 *get* 的完成体形式 *has got* 已经成了非完成体形式的状态动词 *have* 的语义对应形式,即相当于 *He has a cold*。(714—715 页)。这一点是很有远见的,寥寥数语既勾勒了完成体进一步语法化的方向之一,又解释了导致该演变的语用因素。

三 语法化理论框架形成期的 时体语法化研究

Heine & Reh(1982)与 Lehmann(1982)两本专著在同一年相继出版,前者侧重事实分析,后者侧重框架建设,标志着语法化研究进入理论框架的形成期。Lehmann(1982/2002)虽然有专门的小节讨论时体语法化,但篇幅只有 4 页。稍后的语法化研究专著 Heine & Reh(1984)则用了 20 多页的篇幅来讨论非洲语言中的时体标记,从宏观上概括了非洲语言时体标记的 3 类来源:1) 名词性的迂回结构,在该结构中时体标记以助动词的形式出现,主动词则以非限定的、名词化的形式出现;2) 连动式迂回结构,在该结构中两个动词都是限定形式;3) 副词性途径,副词经过语义和句法上的演变而成为时的标记。

与语法化理论框架的形成同步的是,时体语法化研究的专题性专著——专门研究罗曼语将来时历史演变的 Fleischman(1982)也应运而生。随后出现了以时体为重点把整个时体与情态范畴作为研究对象并具有明显的语法化研究意识的 Bybee(1985)和 Dahl(1985)。在本时期后期,专门研究英语体貌系统发展的 Brinton(1988)以及时体语法化研究的理论性论文 Bybee & Dahl(1989)相继问世,标志着时体语法化研究成为语法化研究中最有建树的领域之一。

3.1 Fleischman 和 Brinton 的时体语法化专题研究

Suzanne Fleischman 的著作 *The Future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Diachronic Evidence from Romance*(1982)是第一本时体语法化专题研究的专著,与第一批语法化研究的专著同年出版,有重要的学术史地位。Suzanne Fleischman 1975 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罗曼语词源学家和语文学家 Yakov Malkiel。后来受伯克利人文研究基金资助,进行罗曼语历史比较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研究,该书就是这一项目的研究成果。如同语法化的研究源于印欧历史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一样,Suzanne Fleischman 也先后受到这两大学派的影响,从而在时体语法化研究领域领风气之先。

Fleischman 特别关注将来时的演变所体现出来的时体与情态范畴之间的演变路径。a 是将来时的演变路径,b 是 a 对应的上位语法范畴之间的演变路径(根据第 129 页的图 4 整理而成):

- a. 义务性 → 展望性 → 将然性 → 可能性等
 b. 情态 I → 体 → 时 → 情态 II

根据这一路径,将来时成为联结体与情态这两个范畴的关键环节。有的将来时形式的语法化经历了其中的全部环节,有的则只经历其中的部分环节。比如,罗曼语普遍存在的源于“去”义的将来时形式没有经历情态 I 的环节,直接从词汇意义发展出表示事件即将发生的展望性(prospection)用法,然后发展出将来时用法。

这一路径中,最需要解释的是展望性(prospection)用法。作者认为,类似于汉语“天要下雨了”的用法,与“天刚刚下雨了”是一对体的用法,前者是展望性用法,可称为展望体,后者是回顾性用法,通常称为完成体,两者都跟说话时间相关。不过,后来更多的研究者如 Bybee et al. (1994)把这种用法看作跟将来时相关的用法,具体称为最近将来时。这样一来,从展望

性用法到将来时用法的发展就被视为将来时内部子范畴之间的扩展,从而避免了某个形式的用法在时、体、情态三个上位范畴之间频繁切换的现象,更符合语法化的渐进性。

Brinton(1988)可能是体貌标记语法化研究领域里最早的专著。该书的研究对象是英语动词前的 *begin*, *continue*, *stop* 等链接成分以及动词后的 *up*, *down*, *on*, *along* 等小品词。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得作者无法直接套用传统的概念系统,不得不创造性地使用 aspectual^①(体貌)来概括语法手段表示的 aspect(体)和词汇手段表达的 aktionsart(动词的语义类型,这里相当于情状类型(situation)),并用一半以上的篇幅来讨论研究对象在英语共时体貌系统中的地位。*Begin*, *continue*, *stop* 等被称之为体貌标记语(aspectualizer),它们分别标记起始体(ingressive)、延续体(continuative)、“完停”体(egressive,包括结束、停止等意义)。动词后 *on*, *along* 也发展出表示延续体或反复体的用法,*up*, *down* 等仍然为 aktionsart,用来表示终结性(telic)情状。作者指出起始体、完结体这些“阶段”体(‘phase’ aspect)不宜直接归于完整体(perfective)的下位范畴,因为它们不是表示所谓的整体性观察,而是强调事件的开始点和结束点,只能与表示时点的时间短语共现,而不能与表示时段的时间短语共现(如: *He began to write {at 5:00 / * for hours}*),因此应当区别对待(第 52 页)。Brinton(1988)的这些观点,实际上是在传统的语法性质的体范畴中,进一步区分出两类体:一类是阶段体,一类是表示视点的体,这一区分在文献中是相当早的。只是作者的研究重心在于体貌的历时演变,因而没有系统地发展这一理论。或许 Brinton(1988)在古英语的材料使用上还有可商榷之处(参见 Allen, 1990),但是,这并不影响该书在英语体貌系统的发展、体貌理论研究、语法化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

3.2 Bybee 与 Dahl 的时体语法化宏观研究

Bybee(1985)以 50 种语言的材料为基础,用 4 章的篇幅讨论体、时、情态范畴的形式与意义的关系。Dahl(1985)则以 64 种语言的问卷调查材料为基础,重点讨论时体范畴的共性。这两部独立研究的著作在同一年出版,反映了 Joan Bybee 和 Östen Dahl 在研究取向上的诸多相似之处:1) 从形式到功能的转变。Bybee 早年研究生成音系学,Dahl 则研究逻辑语义

① Dik(1989/1997)使用的是 aspectuality。

学;2)对跨语言的语料有着强烈的渴求。Bybee认为不应该排除语言处理和语言演变的材料,Dahl认为对语料的渴求直接导致其转向更多地以语料为导向的研究。3)着眼于语法范畴的普遍特点,着重分析时体系统。4)从类型学走向语法化的研究。两者都是典型的类型学研究,但都认为要解释书中的描述性共性,就必须进一步分析时体系统的使用以及这些系统是如何演变的。(Dahl, 1985)。用语法化的分析思路来解释跨语言的共性与个性在书中处处可见。

共同的研究倾向直接促成了 Bybee & Dahl(1989)(The creation of tense and aspect systems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这篇时体语法化理论性论文的诞生。这篇论文旨在整合 Bybee(1985)和 Dahl(1985)的研究成果,以便以时体问题为个案深入探讨有关“语法语素”的普遍理论。基于共时与历时的证据,两位作者把世界语言的时体系统分为三类:1)三分时体系统。以完整体与未完整体的区分为基础,对于未完整体进一步区分其过去时与非过去时,对完整体不再进行过去时和非过去时的区分。这种三分的时体系统体现了绝大多数语言的屈折范畴的性质。法语是典型的三分系统,英语动态动词的过去式相当于完整体,进行体与完成体的对立还没有发展成屈折形式。汉语大致可以归入这一系统。据笔者理解,因为汉语既没有典型的屈折形态,也没有典型的时的语法区别;即便如此,汉语通用语也发展出语法化程度较高的词尾“了”“着”来区别典型的完整体与未完整体的对立。2)以俄语为代表的斯拉夫语类型的时体系统。俄语是以动词的派生形式来表达完整体与未完整体的对立,这些派生形式还保留着比较具体的语义类型,以表示事件的开始、结束、短暂持续、反复等。与此同时,俄语的时则独立于体的区别。这种以派生的手段来表达体貌与三分系统中多以屈折形式来区别体貌构成了显著的区别,不过,从历时的角度看,斯拉夫完整体表达形式的发展过程依然符合从迂回到屈折的发展路径。3)以芬兰语为代表的、以格标记的方式来表示事件的体貌属性,比如以直接宾语的宾格形式表示事件的结束等相关概念,相对于三分系统,这一系统更加接近于斯拉夫语类型的时体表达。

通过对时体系统具体的语法语素类型的深入研究,作者强调:对于某个“完整体”语法语素的深入理解不是来自把它视为体系统的一个次范畴的成员,而是来自把它视为一定范围的发展路径中的一个案例;即可以把该语法语素与其他具有类似词汇来源、处于近似语法化阶段的完整体形式进行比较,从而获得对该语法语素的深入理解。这意味着我们不必刻意把